臺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六期
2007年6月　　頁241～284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章太炎與魯迅的師徒交誼重探

——兼論二氏的學思關係

陳　學　然*

提　　要

章太炎(1869-1936)與魯迅(1881-1936)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影響深遠，學界對他們的研究可謂已是汗牛充棟。關於二氏的師徒交誼與學說思想的傳承關係，一直以來也備受重視；但不少論述僅流於表面，未能釐清他們的眞實交誼與學思關係。本文首重於辯正二氏的交誼關係，並兼及他們的個性特質、文化立場與救國心態等學思差異問題。全文將由以下五個要點展開探討：第一是簡述過去相關研究主題趨向。第二是釐清二氏的結緣經過和他們的一生交往情況。第三是簡論早年魯迅的學術與章氏的關係和他後來如何評價師說。第四是闡述魯迅與章氏在學術觀點上、特別是國學與白話文方面的歧見和他不敢（或不欲）面見乃師的原因。第五是綜合前述各點而展現二氏的個性與眞實交情。藉著上述數方面的探討，冀能補正目前論述的某些闕失，客觀呈現二氏的交誼與學思關係，並使二氏的思想個性更全面地呈現出來；或者，重探之結果，對進深反思中國現代學術思想譜系的建構也會是有所俾益的。

關鍵詞：章太炎、魯迅、師徒交誼、學思關係、白話文

本文於96.01.08收稿，96.05.16審查通過。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博士研究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ang Tai Yan and Lu Xun as teacher and pupil: Their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revisited

Chan, Hok-yin*

Abstract

Zhang Tai Yan (1869-1936) and Lu Xun (1881-1936) are two influential figure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of ideas. Their relationship as teacher and pupil has been the object of considerable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hey treated each other pers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by way of an account of their temperaments, their views on culture, patriotism, and academic issues, particularly the issues concerning classical study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It is hoped that such an account can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ideas which have shaped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Zhang Tai Yan, Lu Xun, relationship as teacher and pupil,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vernacular language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章太炎與魯迅的師徒交誼重探

——兼論二氏的學思關係

陳　學　然

一

「魯迅研究」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歷時大半個世紀後依然是一門未見衰微的顯學，魯迅的師承問題向來無甚爭論，咸認爲章太炎就是他最尊敬的老師。的確，在魯迅研究領域，他跟章氏的交往和他對章氏其人其學的觀感常被津津樂道。現時能看到的相關文章便有逾百篇。當中有三分之一是寫於文革十年的。在那個以政治掛帥的年代，學術論著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這些相關論述，呈現了這樣的一種共識：把章氏視爲辛亥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認爲他的法家思想直接影響了魯迅。魯迅是文革十年唯一被絕對肯定的知識份子，他的待人接物態度極受關注和仿傚。弔詭的是，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轉變，他的待師態度均被當時人視爲學習典範。在一度流行的批判父母與師輩的運動中，魯迅是以勇敢維護眞理而大力批判師輩的形象出現。用任訪秋的話說：魯迅在對待章氏的態度上「充分表現出馬克思主義者論人的標準，即政治第一，學術第二。」[1]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鄭師滋斌先生的提點，而洗師景炬先生修正了本文的英文提要，本人在此一併致謝；同時，本人也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中肯而細緻的審查意見。

[1] 任訪秋：〈魯迅論章太炎〉，《魯迅散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 9 月），頁 105-106 。（原載 1977 年《山東師院學報》第 2-3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四人幫」倒臺和撥亂反正的開始，魯迅的待師態度和言論同樣成爲模範和金科玉律，但這時的用意是在於要反過來批判「四人幫」先前對魯迅的改造與利用，並藉魯迅與太炎的交往而重新樹立起「『尊師愛生』的傳統信條」，由是而抨擊文革十年大中小學生把老師「打入牛棚、游街批鬥」的瘋狂暴行。於是，曾一度看重的魯迅對晚年太炎的嚴厲「階級」批評，文革後便緩和了，代之以——老師即或有「既離民衆」、「漸入頹唐」的思想缺點，也要以善意的態度批評，同時還要待以同情的理解態度。這樣，「反映我們的革命前輩是怎樣正確對待自己的老師，正確處理師生之間的關係，以達到明辨是非；正本清源作用」便成爲時人研究魯迅與太炎師徒關係時宣稱的「眞正目的和意圖」。[2]

在強勢的魯迅話語和研究熱潮下，魯迅對章氏其人其學的部份觀感與評議影響了章太炎研究。始盛於1980年代的章太炎研究，不少文章均提及二氏的深厚師徒交誼，也探討了魯迅受章氏學術思想影響的問題，藉以確立起章氏在近代思想史上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身份角色。一些章太炎的傳記或專書研究便直接套用了魯迅對章氏蓋棺定論的文字，繼而申論章氏的學思活動，可謂是延續著魯迅的太炎觀感。[3]站在魯迅研究的學術場域中，當要爲魯迅的戰鬥精神、反傳統禮教思想探本溯源的時候，往往會追溯至他與章太炎間的師徒關係以及當中的思想繼承問題。不過，魯學研究者多會群趨指出魯迅在哪方面比章氏優勝，進而爲魯迅建立起完美人格典範。[4]站在章太炎研究的學術場域中，我們也不難看見論者從太炎的學說思想論及他如何影響魯迅，進而反過來證成太炎本人對新文化運動

[2] 魏若華：《魯迅與他的老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頁125。

[3] 以湯志鈞爲例，其《章太炎傳》對晚年太炎的評議便是在魯迅的思想框架下開展的。所要說明太炎者，不過是他的種種落伍言行都如魯迅所說的「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一語而已。湯志鈞：《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319-392。

[4] 同註1，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培植灌溉」與「啓蒙」功德（借用毛子水之語）；[5] 同時，章學研究者大多都承認，魯迅對乃師的蓋棺定論是恰當的，甚至有的認爲章氏能有如斯偉大且對其尊重有加、推心置腹的學生，實是一種光榮與安慰，故云「章炳麟地下有知……也該含笑於九泉了吧！」[6]

當二氏的深厚師徒交誼被建立起來後，近二十年來的研究便趨向於探求他們在思想上之「同」而較略其「異」。與此相輔相成的是，他們的緊密交往關係也進一步地受到強化和美化。但是，當閱讀材料的視角擴大後，或是對有關資料如魯迅筆下的章太炎形象細心加以閱讀後，則不難發現他們的實際交誼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深厚，魯迅對章氏其人其學的評議也不是只能讓人看到他對師輩的深刻懷念和彼此間的深厚交誼，他的待師之道也不一定正確和堪作表率，我們在今天更無需孜孜謹守他的觀點來評鑑太炎的一生功過。從他對章氏的不少嚴厲、且又不周延和不公正的批評中，讓我們看見的其實是他們之間存在了巨大的思想落差。當釐清他們的一生交往後，便能發現他們的交誼存在了變化，而他們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更是斷絕交往。基於這點，他們的交誼與學術思想關係是值得我們再作思考的，即使是魯迅那篇廣被援用的章氏蓋棺定論——〈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也有重新仔細閱讀的需要。

要言之，章魯二氏的學思繼承問題、師徒結緣經過與一生中的交往關係等等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研。在研究這個課題時，擴充史料的研究範圍和仔細閱讀文本資料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故除了閱讀二氏的年譜、書信、日記以至其他相關文章外，也有需要搜尋二氏身邊人的有關記述與回憶文章，並加以分析取證。還有，透過觀察二氏對待其他人的態度後再反觀他們對對方的觀感，也有助於釐清他們的交誼深厚的問題。譬如是，章氏對魯迅的態度是否有別於對待其他門生？魯迅對章氏的觀感又是否有別於對待其他的師輩？諸如此

[5]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陳崧：《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2 月），頁 126。（原刊《新潮》第 1 卷 5 號，1919 年 5 月。）

[6] 姜義華：《章炳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7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問題，互經比較後，相信能爲我們提供研究取資。下文先概述二氏的結緣經過。

二

魯迅與章氏結師徒緣的時間衆說紛紜，有言是始於1908年，有言是始於1906年；[7]也有的說是1907年，持是論者還認爲魯迅在這年與錢玄同、周作人等在東京創立「國學振興社」。[8]但事實上，「國學振興社」是在1906年由章太炎及其學生錢玄同等創立的，而魯迅是無可能在1907年便已認識章、錢諸人的。這樣，就更不要說是與章門上下合力「振起國學、發揚國光」（「國學振興社宗旨」）了。[9]

根據當年與魯迅留學日本的太炎門生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周作人的記述，是可以釐清他第一次面見太炎的確定時間。許壽裳說：「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朱逿先（希祖）、錢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號一致）、周豫才（樹人）、啓明（作人）昆仲、錢均夫（家治），前往受業。」[10]另外，他的《魯迅先生年譜》也有相關

---

[7] 唐弢：《魯迅——文化新軍的旗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頁4-5。唐文權：〈章太炎和魯迅〉，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8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頁139-140。（寫於1979年2月）

[8]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01.

[9] 《國學講習會略說》，日本秀光社印行，1906年9月出版。參引自：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318。另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216-217。

[10] 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頁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錄：「是年（一九〇八）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11] 從這裏看來，魯迅與太炎首次見面的時間應是1908 年，而彼此之前是沒有交往的；與魯迅留學日本東京時同居共學的二弟周作人，在其五篇提及到民報社聽太炎講學的文章中，也沒有記述魯迅在此之前曾面見太炎。[12] 另外，錢玄同的〈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也說明1908 年以前的太炎並未認識周氏兄弟：

> 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來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13]

這些文字說明太炎在1908 年之前還未認識周氏兄弟。與「伍舍」[14] 諸人熟稔的是在1910 年成爲太炎長婿的龔未生，龔氏便是伍舍諸人得以與太炎交往的橋樑。目前有些論述把魯迅說成是這個學習小班得以成立的關鍵人物，實是不知所據何自。根據朱希祖日記，魯迅等人是在1908 年7 月11 日早上8 時左右第一次面見章氏。朱氏《日記》清楚記述太炎每次舉辦國學講習會的時間與地點。他是在1908 年3 月22 日下午在牛赤城元町清風亭首次聽太炎演講的，4 月11 日起隨演講會遷至大成中學。至7 月11 日，其《日記》記有：「八時起，至太炎先生處聽講音韻之學，同學者七人……。」[15] 按此，我們便知道這個在章太炎研究領域中廣被津津樂道的「八人學習小班」的確實開課時間，地點是太炎流亡日本時的居所《民報》社，與魯迅同去的還有周作人、許壽裳、

---

[11] 許壽裳：〈魯迅先生年譜〉，《魯迅回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1 月），頁538 。

[12] 這五篇文章分別是：〈關於魯迅之二〉、〈魯迅的國學與西學〉、〈民報社聽講〉、〈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

[13] 錢玄同：〈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年8 月），頁519 。（原載1936 年10 月26 、27 日北平《世界日報》）

[14] 魯迅等五人共同租住的單位，名稱曰「伍舍」，成員有許壽裳、錢家治、周作人等。

[15]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册），頁291-29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家治三人，再加上龔未生、錢玄同、朱希祖及朱宗萊四人共爲八人。太炎在這個講習班講授的主要是語言文字學。許壽裳說：

> 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几。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者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義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眞所謂「誨人不倦」。……這是先生東京講學的實際情形。[16]

魯迅在班中是屬於比較沉默的一員，對師說亦有所保留。許氏說：

> 聽講時，以逿先（即朱希祖）筆記爲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爲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爲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啓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眞理」的態度！[17]

章氏對「文學」的定義是否過寬以及魯迅對文學與學說的二元判分又是否恰當，學術觀點上的是非問題大可不必在此探究。要闡明的是魯迅在講習班的大概學習情況。在此，我們或可以預先指出，魯迅在早年便以批判的態度接收師說，至中晚年則與乃師在學術道路上分道揚鑣，晚年時更自稱因爲白話文的主張與章氏有異而不敢前往面見。自1915年探訪章氏後，他以後再也沒有與章

---

[16] 許壽裳：〈東京講學實際情形〉，《章炳麟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03-105。

[17] 許壽裳著、馬會芹編：《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氏來往了，儘管大家有不少時間都是住在上海。這一值得注意的交誼史實，後文是會詳加闡述的。

八人學習小班維持不到一年便結束，其間發生《民報》社被日本政府封禁案，章氏因爲繳付不起罰款而險遭牢獄之災，幸得許壽裳與周氏兄弟籌集贖金而避過此劫。[18] 1909 年 8 月，魯迅因需要謀事養家而離日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章氏則於 1911 年 11 月 16 日歸國抵達上海，繼續熱心於議政和投入文化建設。至 1913 年 8 月，他因反袁世凱而被拘禁，至 1916 年 6 月 8 日獲釋。被禁三年期間，魯迅曾有數次前往探望的記錄：

1. 1912 年 12 月 22 日「同季市赴賢良寺見章先生。」
2. 1914 年 8 月 22 日「午後許季市來，同至錢糧胡同謁章師。」
3. 1915 年 1 月 31 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歸。」
4. 1915 年 2 月 14 日「午前往章師寓，君默、中季、逿先、幼輿、季市、彝初皆至，夜歸。」
5. 1915 年 5 月 29 日「下午同許季市往章師寓。」
6. 1915 年 9 月 26 日「往錢糧胡同弔龔未生夫人。」[19]

此外，《日記》還有三次提及章氏的文字，其中一次提及章氏送他字畫一幅，他後來托三弟帶回故里。條幅的內容是《莊子・天運篇》的：「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涂卻守神，以物爲量。」時值身陷牢獄的章氏曾一度絕食以死抗爭袁世凱，幾經親人門生勸慰才重振精神，他以莊子筆下黃帝如何因至樂之道而產生心境變化的文字托許壽裳轉贈魯迅，既有抒發胸臆、互相勉勵之意，也有意藉此告慰一衆弟子不需爲己擔憂。從這裏看來，魯迅與太炎確有師生關係，民初數年間亦有過從。但這些並不足以說明他們一生中交情篤厚。相反，他們在晚年二十多年裏彼此是沒有任何文往的。當中原因，與

[18] 周遐壽（作人）：〈民報案〉，《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魯迅的故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5 月），頁 121。

[19]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 8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家在學思上出現的巨大分歧關係密切。下文便將論及早年魯迅在學術思想、文字風格上與太炎的某些關係和他對章氏其人其學的觀感變化之跡。

三

魯迅早年發表的論文〈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在行文風格及思想精神方面被認爲是深受章氏影響，[20] 或者是被看作「簡直就是太炎思想的翻版」、[21] 處處透現章氏的「影子」。[22] 他早期著譯的文風以及對小學的愛好也被認爲是深受太炎影響，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便是用文言文寫成的，文字古奧難明，書名「域外」寫成「或外」，蔡元培更指《域外小說集》比林琴南所譯的還要古奧。[23] 早年魯迅好寫古字的傾向還見於他任教師範學堂時的生理學講義，他「故意用著許多古字代替某些事物。例如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來表示男陰，用『午』字表示精子」。[24] 魯迅追憶往事時曾承認「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25]「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26] 他也曾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和自己的詩文共60 多篇編成詩文集，並將之分類編排，裝訂成册並手

[20] 李澤厚：〈章太炎剖析〉，《中國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1 月），頁 731 。

[21] 汪榮祖：《章太炎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 1989 年 7 月 6 日），頁 144 。

[22]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 (1868-1919) 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1985 年 5 月 10 日），頁 209 。

[23] 李何林主編：《魯迅年譜》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頁 408 。

[24] 王治秋：《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澳門：爾雅社， 1978 年 2 月），頁 65 。

[25] 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集外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頁 4 。（原寫於 1934 年 12 月 20 日）

[26] 魯迅：〈題記〉，《魯迅全集・墳》第 1 卷，出處同前註，頁 153 。（原寫於 1926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目次。據云此本詩文集及目次的手迹至今仍存。[27] 他還挑選了太炎的兩篇獄中詩作〈獄中贈鄒容〉、〈獄中聞沈禹希見殺〉刊於由浙籍留日學生發行的《浙江潮》。晚年魯迅對這兩首詩印象依然深刻，自言是「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28] 至1936年9月25日離他逝世前的24天，於病裏執筆寫信給許壽裳說：

> 讀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靜安沒後，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諸詩及《逮死》等，實爲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匯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遺將來。[29]

他隨後又建議許壽裳發起、「向種種關係者募捐」，盡快印行太炎的詩文。這事例使我們看到晚年魯迅對太炎在早年時寫下的戰鬥詩文是推崇有加的。

中、晚年的魯迅雖揚棄了年輕時寫怪句字和寫古字的偏好，但他那持論尖銳、說理精闢的散文，其犀利的文字風格被普遍認爲是直承太炎而成，說是深得太炎眞傳、盡顯魏晉文章神理云云。[30] 要之，諸種論調之意在於說明魯迅的文字風格與思想確曾受太炎的影響，或者說是不止於影響而已，他在發揚太炎學術影響力方面也曾起到積極作用。譬如是，當我們要估衡太炎的語言文字學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曾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和發生過怎樣的影響力的時候，就應從他的標音字母被納入國家教育制度這一事件著眼，因爲這意味著它將在全國初中級學校教育中得到實際運用。而使其有機會被落實在國家教育制度的，便是1913年春聯袂出席全國教育會召開的讀音統一會的章門弟子，時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適時便涉事其中。

目前相關論說大多不離於援引上述諸例，藉以證說二氏的學思關係與師徒

---

[27] 同註23，頁405。

[28]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4月），頁442。

[29] 魯迅：〈致許壽裳〉，《魯迅書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8月），頁1042。

[30] 曹聚仁：〈我與魯迅〉，《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3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交誼。但必須指出的是，魯迅受太炎學思影響者以年輕時段較爲明顯，而他與章氏的交往關係則可以說是只限於早年而已。1917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後，與章氏已沒有交往的魯迅在文化立場與學術觀點上往往與師立異，在國學、國粹、白話文等問題上尤是針鋒相對，評議時也語多譏諷調侃。據此最後可發現到章氏在魯迅眼中並不是最值得尊敬的師者。

許廣平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提及魯迅曾憑勇憑智勸太炎停止絕食，此事被奉爲史料而廣受援引。[31] 許氏立論以及相關援用者的目的是要藉此證成魯迅與太炎間保持著深厚師徒交誼。魯迅在她的筆下儼然變成爲章氏最信任的人，且是章門弟子代表：

> 魯迅先生對於章太炎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總嚴肅地稱他太炎先生。當章先生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時，曾經被逮絕食，大家沒法子敢去相勸，還是推先生（按：指魯迅）親自到監獄婉轉陳詞才進食的。[32]

然而，有不少資料足證這段記述是虛構的。《章太炎自訂年譜》、《章太炎家書》、《章太炎書信集》、親自見證太炎絕食與復食的馬叙倫的《石屋餘瀋》、徐一士的《一士類稿》、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册）》都讓人認識到太炎復食與魯迅毫無關係。還有，許氏之論不獨未見於魯迅本人的文字記述，對魯迅一生事蹟知之甚詳的許壽裳在撰述《魯迅年譜》時亦沒提及此事。

章氏被拘禁期間，早期較少人探訪，太炎自言是「終日默坐室中。弟子獨錢季中及貴陽平剛少璜時時來候。」[33] 探訪者後來逐漸增多；家人與弟子黃侃在來京後即搬至錢糧胡同居住。太炎門生中除了黃侃與一直侍候甚殷的錢玄同外，還有爲師筆錄《訄漢微言》的吳承仕以及馬裕藻、朱希祖數人。這批門弟子在後來參與乃師籌辦的學術活動如編輯《章氏叢書》、創辦刊物、成立章氏

---

31 孫伏園的〈魯迅先生二三事〉、任訪秋的〈魯迅論章太炎〉與王冶秋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均墨守許說。

32 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同註 13（第 3 卷），頁 144-145 。（原載 1940 年 8 月 1 日重慶《文藝陣地》（半月刊）第 5 卷第 2 期）

33 章太炎：〈自定年譜〉，同註 15 ，頁 46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學講習會等均很投入。反觀魯迅則完全缺席這些活動，也沒有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34] 太炎逝世後，衆弟子特於《制言》闢劃紀念特刊，但見不到魯迅的文章或悼詞。這反映了魯迅在後半生與章門弟子的交往疏密問題。

事實上，魯迅確不太喜歡與許壽裳以外的其他同門友儕交往。他在1936年9月25日致許氏的信中，曾囑咐許氏不要向人透露刊印太炎文章是出於他的建議，原因是：「因舊日同學，多已崇貴，而我爲流人，音問久絕，殊不欲因此溷諸公之意耳。」[35] 早於三年前(1933)，太炎曾指揮弟子刊印《同門錄》，周氏兄弟中只有周作人一人榜上有名，而沒有列名其中的魯迅後來對乃師此舉亦多有非議，言語間亦涉及同門。其言曰：「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衮，粹然成爲儒宗，執贄願爲弟子者綦衆，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册。」[36]「倉皇製《同門錄》」一語，讓人感到他對章氏此舉是有所鄙夷的，故特拈此事批評。但問題又讓我們想到，章氏何以不把這名曾問學於門下的舊生列入名錄中呢？這值得後文再論。

目前研究都注意到向來特立獨行、具抗流逆俗個性的魯迅在生命最後一刻寫下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但都較趨向於從這篇文字中溯尋他對章氏的懷念之情，尤其看重他在爲章氏一生功業蓋棺論定時的褒揚之詞：

> 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僧，勾結小報，竟也

[34] 太炎主編的《制言》，分別刊有「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起人」的名單，列名者皆爲太炎弟子，如有吳承仕、汪東、黃侃、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周作人、許壽裳、沈兼士等年資較深的太炎門生，也有年資較淺的馬宗霍、姜亮夫、沈延國等人。但魯迅並不列名其中。第二份名單則是當時的社會人士的名單，名作「章氏國學講習會贊助人」，如有宋哲元、馬良、李根源、金天翮等。
以上二份名單均見：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制言》第1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2。（原刊於1935年）

[35] 同註29，頁1042。

[36] 同註28，頁4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眞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爲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37]

魯迅這段對乃師的蓋棺定論確如目前研究所指出的，它能讓我們了解到太炎的一生功業，也讓我們了解到魯迅在人生最後一刻對他的懷念和維護。不過，這篇文章的其他內容與涵意是未受到足夠關注的。過去有個研究現象是這樣的：如果撰文目的是要證立魯迅與太炎的交誼和思想關係，上述具維護、懷念意味的文字便會被直接引用；反之，只有在闡明魯迅在待師態度上如何講求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時，下述文字才會被選擇性地引用：

> 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爲大多數所忘卻。……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受饋贈，遂每爲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衮，粹然成爲儒宗，執贄願爲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冊。[38]

求魯迅以客觀正確態度對待師說者，多會認爲這是魯迅爲世人示範的最佳範例，並將其言視爲對章氏的權威定論、是「實事求是的『懸諸日月而不刊』的確論」。[39] 但也有較爲客觀和持平之論，僅視之爲「中肯的評價」。[40]

不過，在爲師輩作蓋棺論定時，只強調褒貶互舉的中肯、客觀態度不見得就是做到了情理兼備。退一步言，一位眞的被視爲「愛吾師」而又對師態度甚恭的及門弟子，他在評價、追憶乃師其人其學時，情理兼備其實也不是他的第

---

37 同註 28 ，頁 444 。

38 同註 28 ，頁 442-444 。

39 史莽：〈論魯迅對章太炎的評價〉，章太炎紀念館編：《先驅的蹤跡：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頁 68 。

40 同註 3 ，頁 39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義考慮因素。事實上，其語氣措辭與評價原則與一般人或後來的史事評述者肯定有異。後文的探討將進一步地讓我們發現魯迅對章氏的評議、觀感態度等等不多像一位待師甚恭之人所應有之自然表現，至少是與章氏其他及門弟子有異。當然，這樣說並不代表認同重情輕理的待師之道，更不有意輕忽實事求是的評議原則的重要性。所要說明者乃在於太炎在魯迅心目中的眞正地位與觀感等問題是有重新釐清的地方。

其實，魯迅在其他文章中對章氏是多有批評的，那些貌似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幽默文字同時也讓人感到充滿了挖苦、譴責之意：

> 清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聲名，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爲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後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爲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壯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然而是拉車屁股向後，這裏只好用古文，「嗚呼哀哉，尚饗」了。[41]

當魯迅如此評議章氏時，大家早已沒有任何交往了。他筆下的章氏不再是清末十年中的革命家，已變成一位存心復古和依附軍閥的落伍者與窩囊者。但這些描述對章氏是不公允的。

章太炎自 1916 年重獲自由後，對集權過重而施行獨裁統治的北京中央政府大表反對，認爲國內數年間的種種致亂原因恰是源於「夸者」爭奪總統、總理二職而起。爲了虛置中央政府，停息爭位攘權之事，他大力鼓吹「聯省自治」，與抗拒中央政府的南方地方軍閥互有來往。章氏與他們在「聯省自治」方面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與盤算，章氏爲國家民族的大局安危與長遠發展作考慮，地方軍閥則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地方管治權力才樂於響應章氏的呼籲。在這件事上，姑勿論太炎之政見高明庸愚問題，但其舉措無疑是出於經世救國之志，亟欲爲國家的平

[41] 魯迅：〈趨時與復古〉，《魯迅全集・花邊文學》第 5 卷，頁 434 。（寫於 1934 年 8 月 1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穩安定尋找出路。如果將其與地方軍閥的來往純粹看作爲依附軍閥，又或者以此評斷其思想「後退落伍」、「頑固保守」——甚或是魯迅所說的「白圭之玷」，都有嫌過於簡單化。對於作爲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太炎既要在政事上借助其力，但對其也不唯唯諾諾。在孫氏親赴旅舍拜謁時，章氏直言相勸他在其位上要「好自爲之」，《申報》載孫氏「頗韙其言」。[42] 在此必須補充的是，我們並沒有證據說明章氏參加了孫傳芳的投壺活動。

晚年經濟貧困而又亟欲興學施教的章氏倘若接受了「饋贈」，魯迅也無需用調侃筆調詬病其人格。事實上，晚年章氏在衆弟子協助下用籌得款項興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其中也包括了蔣介石透過屬下丁惟汾「饋贈」的一萬元支票，在章夫人湯國梨的安排下充作講習會的助學金，解決了清寒學子的一些費用困難。[43] 相反，只以旁觀者角度對章門各種活動作冷嘲熱諷的魯迅，一直以來沒有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和關心。從上引文字及後續文字中，都能看見他那些充滿譏刺意味的文字顯示了對師輩缺乏敬意。所謂畢其生對章炳麟「執弟子禮甚恭者，當無過於魯迅即周樹人」[44] 的論調尤不足信。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篇權威性的蓋棺定論，說明了魯迅一生中所敬重的章氏只是清末時期投入革命運動時的章氏，亦即是停留在記憶裏的章氏，絕非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被他譏爲「與時代隔絕」的章氏：

> 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爲了駁斥康有爲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一九〇六年六月

[42] 〈國內要聞・徐章聯袂返滬〉，《申報》（ 1926 年 2 月 27 日），見自：《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册），頁 851 。

[43] 有關章太炎與身邊人如何處理蔣介石的捐款，可參湯國梨（口述）、胡覺民整理的〈太炎先生軼事簡述〉，沈延國的〈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湯炳正的〈憶太炎先生〉，蕉園的〈樸學大師章太炎故宅訪問記〉。以上數文均可見於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

[44] 同註 6 ，頁 70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和「XX」的XXX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XXX鬥爭，[45]眞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46]

魯迅所憑弔和追憶的不是民初的章氏，他對章氏的美好印象只停留在清末的排滿革命時期，但他眞正欣賞的還只在於章氏那些有助推動革命風潮的戰鬥文章而已，至於章氏的淹通經學和深厚語言文字素養，則不是他所看重的。他的文字使人認識到當時前往「《民報》社」聽講的目的是要目睹一代革命家的風采多於嚮往他的學養。故他的上課表現是沉默的，在一年多的聽課裏只有一次發言，而在課堂裏甚爲投入的錢玄同則被他起號譏爲「爬來爬去」，而他在背後對章氏的學說也有不滿。[47]因此，究其臨終前指自己對當時的講課「一句也不記得」也盡非虛言。不過，此言多被視爲不過是他的「自謙」之詞。因爲紹興魯迅博物館珍藏有二册他在日本聽課時整理的《說文解字扎記》手抄本，足證他當時如何逐字詳記太炎所講的字義、字形與字音云云。[48]於是，這樣一絲不苟地對待太炎講課，無可能會對章氏的授課一句也不記得。此論即或成立，但它是否正好揭示了晚年魯迅有意排拒章氏學術和消減其影響力之意圖呢？退一步言，縱然可以找到他的一些文章中還殘留著得益自早年章氏語言文字學的痕跡，但也無助於說明章氏對魯迅的強大學術影響力或者是魯迅對章氏的衷心敬仰。相反，有些例證恰似流露了魯迅有意調侃章氏而要使其在時人面前尷尬難

[45] 據《魯迅全集》注釋，前句「XX」疑爲「獻策」二字，XXX當指吳稚暉；後句XXX係指藍公武。見《魯迅全集》第6卷，頁618。

[46] 同註28，頁442-443。

[47] 許壽裳：〈從章先生學〉，《魯迅生平史料匯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2。

[48] 同註21，頁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堪的意味。譬如：

> 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現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Tiu 。故 Tiuhei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49]

我們可以追問：爲甚麼自稱對章氏講學內容「一句也不記得了」的魯迅，卻偏偏只記得師輩這則錯誤講解「州」字的例子？如此煞有介事地將乃師錯失公諸於當世，目的是要凸顯自己的實事求是態度，還是有意炫耀自己的語言文字學根柢？在他反證章氏的錯處時，拈取的例證偏偏就是廣府話中最鄙俗的「罵娘」穢語「Tiu-na-ma 」和令人反感的市井髒話——「 Tiuhei 」。這種喜歡用遊戲筆墨來調侃師輩學問的侍師之道，在今天已然不值得效習；而魯迅的侍師之道也未做到眞正的情理兼備。

令人悲嘆的是，文革時期的魯迅是唯一一位廣受億民景仰的知識份子，但當全國上下颳起學習魯迅風的時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師輩最受後生小輩欺凌毆辱的時代。

下文將會闡述魯迅對待師說的態度，嘗試梳理他說一句也不記得太炎授課內容的內在思想脈絡。無論是魯迅自稱不記得太炎講授的《說文解字》內容，還是他在 1915 年以後終止與太炎交往，都與他本人維護新文化的立場息息相關；同時，他對章氏其人其學的批評也是有意消減太炎在 1920 年代以來在倡導國學和反對白話文的影響力。

---

[49] 魯迅：〈在鐘樓上——夜記之二〉，《魯迅全集・三閒集》第 4 卷，頁 27 。（寫於 192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

魯迅很不滿意民國時期的章氏行誼，雖然將之總結爲「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但無可否認的是，章氏的文化立場與社會活動確令他產生很負面的觀感，成爲他與之交誼淡薄以至斷絕往來的原因。正如前文提及的，魯迅一生中欣賞的只是辛亥革命前的章太炎戰鬥文章，而這才是章氏眞正影響魯迅之所在，故其一生好寫戰鬥文章以攻訐論敵的風格與早年章氏是毫無二致的。晚年時放棄這種文風和戰鬥個性的太炎卻是他不感滿意的，故將其視爲自築門牆與時代隔絕起來的人；當然，說章氏趨向寧靜頹唐，實是值得商榷的。

在清末的年青知識份子眼中，章氏除了是廣受敬仰的革命家外，也是最受推崇的國學泰斗，[50] 是革命派陣營中唯一足以抗衡康梁保皇黨的革命理論家與宣傳家。章太炎本人也認爲自己在排滿革命中曾發揮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故有「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之論，[51] 並深信自己功蓋孫中山、黃興諸人。[52] 不過，他在實際生活上確沒感受到革命成功帶給他的喜悅，因爲民初政局的混亂情況遠超出其想像。但混亂政局並沒使他退居成爲寧靜、頹唐的學者。他仍然熱心於政事與文化事業。在政事上擔任光復會會長，又任中華民國聯合會會長、統一黨暫行總理、共和黨理事、《大共和日報》社社長等職，也出任了袁世凱政府的高等顧問和後來的東三省籌邊使公職。在文化學術圈中則出任了由弟子錢玄同、朱希祖、馬裕藻等人發起的國學會的會長，也出任了浙

[50]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章太炎主編：《民報》第 7 號（日本東京：民報社，1906 年 9 月 5 日）。

[51] 章太炎：〈與陸建章〉，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579 。（寫於 1913 年 11 月上旬）

[52] 太炎對於自己只獲封二等勛章，而革命功勞遠遜自己的孫、黃卻封爲大勛章，他極感憤懣，直至 1933 年下旬向青年人演講〈民國光復〉史事時仍著意在革命事功上揚己抑人，可見芥蒂甚深。章太炎：〈與王揖唐書〉，同註 51 ，頁 494 。（寫於 1912 年 12 月 23 日）章太炎：〈民國光復〉，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181-18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教育會會長；同時，與于右任、張謇、張繼、王正廷等人發起通俗教育研究會，又與馬良、梁啓超、嚴復等人設立函夏考文苑。

1913 年被袁世凱拘禁期間，在對政局前景絕望之際以死抗爭，輕死生之態度一如晚清被囚上海西牢般毫無二致，又作相同慨嘆云：「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53] 將文化之存亡與一己生命繫成一線，盡顯沉重的文化擔荷感；於監禁期間又恐己命絕而學術不得盡傳，故特命弟子吳承仕爲其筆錄口述而成《菿漢微言》，清晰體現了對民族傳統文化存亡而生的憂患意識。1916 年重獲自由出獄，在上海與杭州受到英雄式歡迎，旋即擔任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的秘書長，1920 年因應北京政治中心在十年來的連番政治激鬥所造成的國力虛耗，爲了虛置中央政府及其獨裁者的大權而提出「聯省自治」主張，並任聯省自治會籌備會主席，就此而奔走南方六省遊說地方軍政首腦實行自治，湖南、四川、湖北、江蘇和浙江等省份相繼實行了這一政治主張。[54] 其間，他爲反對國民黨改組和聯俄容共政策而與時人聯合發出《護黨救國公函》，並組織「辛亥同志俱樂部」和出任「反赤救國大聯合」幹部會主席 。1926 年擔任了上海國民大學校長，1927 年6 月被國民黨視爲「著名學閥」而受通緝。

1930 年代，與國民黨政府勢成水火的章太炎不能在上層政治圈中有所活動，但鑒於日本侵略，他還是十分關心政局，除了在各大學或文教機構講演國學以引發國人愛國心外，並與熊希齡、馬相伯等知名人士在上海組成「國難救濟會」，同時和其他六十一位知識份子連署電告黨政高級將領，要求抗日救國。1932 年北上視察前線，與朝野領袖會商國難，[55] 在京津兩地特別拜訪了

[53] 同註 15 ，頁 474 。另，光緒 29 年（ 1903 ），章氏因詆毀光緒之罪被逮入獄，寫有〈獄中自記〉，也嘗云：「上天以國粹付余，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章太炎：〈癸卯獄中自記〉，周弘然編選：《章太炎選集》（臺北：帕米爾書店， 1979 年 5 月 15 日），頁 2 。

[54] 有關章太炎推行聯省自治政治計劃的過程、影響力與實質功效，可參考汪榮祖的〈章炳麟與中華民國〉，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 7 月），頁 78-83 。

[55] 同前註，頁 86-87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段祺瑞、張學良與吳佩孚等北方將領，希望他們能出兵收復東北失土。於其臨終前，留下了足使後人爲之敬仰的兩句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這兩句遺囑，論者稱之爲「極清楚扼要地囊括了這位熱情的民族主義者一生之所言所行」。[56] 憑此，我們見到章氏並不是魯迅口中所說的「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57] 魯迅之言，若不是無知於章氏之行，便是因爲不滿太炎的政事活動、文教活動所致。

在魯迅眼中，「粹然成爲儒宗」的章太炎在新文化勃興的時代熱衷宣揚帶有復古意味的國學，是十分不合時宜的。但在救國救時意識高漲的章氏眼中，在追求「德先生」、「賽先生」的民國新時代宣揚國學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如他在清末時已形成的信念：大舉湧入的西學，其背後所隱藏的是帝國主義者種種不懷好意的經濟掠奪與政治侵略；[58] 民國後的中國仍未擺脫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文攻武略。他認爲構成一個國家或民族眞正滅亡的原因，是在於文化傳統——「國學」先遭滅亡。他早於 1906 年藉國學以排滿時便提出國學存亡必影響民族存亡的論述，認爲它是構成民族的根本條件，也是民族獨特性之所寄。[59] 對於國學亡則國必亡、國學未亡則國家民族猶可興復等信念，他一直堅持未變。

至 1920 年代，呈現在章氏眼中的是一片西學興而國學亡的景象。[60] 他把中國傳統固有文化與學術思想遭遇的打擊咎罪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學之徒」，認爲他們「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的做法直接造成國學不振，使國人自失愛國心源泉、「禍幾於秦皇焚書矣」。[61] 究察人們棄離國故而唯新是趨，他

56 同註 22 ，頁 14-15 。

57 同註 28 ，頁 442 。

58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 1977 年），頁 475 。（ 1908 年 10 月 10 日刊於《民報》第 24 號〈時評〉）

59 同註 50 。

60 章太炎：〈刊行教育今語雜誌之緣起〉，同註 15 ，頁 322 。

61 章太炎（朱鴻召主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41 。（本文於 1935 年 9 月刊於《制言》半月刊，是爲該刊之〈發刊宣言〉，章氏自任主編，由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爲是時人沒有眞識國學的廣博精微，故自1920年代直至逝世的二十多年裏均致力於推行國學教育，嚴厲抨擊眼下「不痛不痒，志趣消磨」的教育，斥之爲「吃鴉片式之教育」。曹聚仁爲章氏編撰的《國學概論》、孫世揚校錄的《國學略說》以及馬勇編選的《章太炎講演集》，基本上反映了太炎晚年熱衷推動國學教育的情況；無論是從他頻繁講演的次數，還是講演內容的旨趣，三書均提供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其旨歸均在於發揚本國文化的優長面和藉此重拾國人愛國心，使民族在西潮泛濫之際力保不亡。而在1930年代的抗日運動中，他也深信讀史足以激動國民愛國熱腸及其在抗戰中能發揮重要作用，故每當向軍人或青年學生作國學演講時均大力強調讀史的時代意義。

不過，在1920年代熱心宣揚國學的章氏在魯迅眼中成爲抗衡西學人士所推舉的代表，[62]是攔阻新文化傳播的象徵性人物。1922年3月29日《申報》刊登了一則《省教育會通告》，指基於「歐風東漸，競尚西學，研究國學者日稀」的緣故而「深懼國學之衰微」，故特別敦請「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的章氏蒞會主講國學，藉以挽救時弊。[63]該演講總共十講，始於4月1日而止於6月17日。章氏在往後的十多年繼續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1934年更在蘇州舉辦大型國學講習會，並建有校舍以供學生住宿。他在這段時期先後與弟子創辦《華國月刊》與《制言》半月刊。從《華國月刊・發刊辭》的「國粹淪亡，國於何有」到《制言・發刊宣言》因批判新學之徒賤視舊籍而說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者用意一貫，最終目的是希望抗衡新學而重振國學，實現「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甄明學術，發揚國光」的宗旨。

在1920年代中期以來，章太炎認爲大學生的最後責任就是「研究國學」和「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1925年10月31日他在國民大學的一場公開演講裏表達了這層意思，鼓勵學生研究國學以反赤，其情形就如

62 魯迅：〈名人和名言〉，同註28，頁289。

63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頁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清十年時那樣：「兄弟從前主張推倒滿清，所以要研究國學；因爲我們研究國學，所以要推倒滿清。研究國學與推倒滿清，表面看來是兩項事，其實就是一項事。」[64] 他希望大學生從國學研究中培養國家的認同感和昌大國性，並把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視爲滅亡中華民族的「赤化政策」，也視共產黨爲一個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政黨，表現出強烈的亡種滅族感。這些均使其感到在新時代裏研究國學的重要性，並再次把國學研究與現實政事扣上關係。他在生命最後二十多年所努力的這些文教志業不但未爲魯迅肯定，相反，與共產黨人關係密切、同時又是站在新文化立場的魯迅是極力反對國學、國粹的，絲毫不把章氏晚年推動國學教育的努力放在眼裏，故不近情理地說他「和時代隔絕」。究其用意或在於斥責章氏跟不上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

魯迅激烈地批判傳統與國民性，對章氏的救國方法多有鄙夷。但本文無意以此否定魯迅的愛國心。相反，他的學行也大可解讀爲以強國救時爲努力目的。問題的關鍵只在於處身新文化運動領導地位的魯迅，他實現愛國強國目標的方法是異於師輩的，認爲不能再透過守護傳統或保護國粹以收救國強國之效。

借用論者之言，魯迅當時選取了「以激烈破壞、激烈個人主義」作爲其實現愛國救國目標的手段，「以致把大規模的毀棄傳統作爲正面價值來信奉」，這樣的行動是痛苦的，但爲了實現國家民族更高的利益而不得不作出某些犧牲。[65] 究其選擇這種手段，是源於悲苦無奈的文化心境。他在23 歲（ 1903 年）寫下的〈自題小像〉刻劃出因民族家國面對之困境而生發的悲願：「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在無奈的困境下，他選擇以打破傳統倫理結構和徹底地重新組合中國作爲救國手段，

---

[64] 章太炎：〈我們最後的責任〉，《醒獅周報》第 58 號第 1 版（上海：醒獅週報社， 1925 年 11 月 14 日）。（章太炎於 1925 年 10 月 31 日在國民大學的演講稿，由黃顯詔筆記。）

[65] 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6 月），頁 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爲「愛國保種之熱情愈爲深切，則打破傳統的決心亦更爲熾盛，二者如影隨形」。[66]

按上述所言的思想脈絡，則魯迅對國學、國粹——甚至它們的宣揚者——章太炎也是要橫加批評的。或許，藉此我們正可以了解到，魯迅何以批判晚年太炎而唯獨對其早年那些抗流逆俗的的文筆風格特別懷念的原因。

國學、國粹在清末被太炎用來批判維護王朝統治的君學，並用以引發國人革命情緒，其中自有解放人心意味。但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即使是給章氏奉爲「國故之本、王教之端」和國粹的方塊漢字，也被魯迅看作「眞是愚民政策的利器」，[67] 而國學或國粹也被直接視爲無用、不過是「孱王和孱奴的寶貝」，用來掩飾人們在西方文化挑戰下產生的「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的精神狀態。（《墳・看鏡有感》）他認爲國粹不需要保護，若保護了則「『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反使過於特別的中國人「從『世界人』中擠出」，被世界拋棄和孤立。（《熱風・1918 年隨感錄第36 》）故一切「國術」、「國技」、「國花」、「國醫」只會使中國更加「鬧得烏煙瘴氣」。爲了使國人不被世界拋棄，他呼籲人們不要再蹲在「國粹」的影子裏張目搖舌。（《三閑集・「皇漢醫學」》）這些言論都是對章氏及其追隨者的「研究國學、保存國粹」與「振起國學、發揚國光」思想的反動。

在魯迅筆下，「研究國學，保存國粹」不再有助光大中國，國粹也沒有正面、積極的價值。當他針砭時弊或批評國民性時，國粹變成挖苦別人時的用語。《熱風・隨感錄第42 》、《準風月談・華德保粹優劣論》、《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監獄》、《集外集拾遺・聊答「……」》、《集外集拾遺補編・寸鐵》諸文把「國粹」視爲「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

66 同前註，頁 125 。

67 魯迅：〈關於新文字〉，《魯迅論文字改革》（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4 年 1 月），頁 3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拖大辮」、「吸鴉片」、「造謠」、「說謊」、「誣陷」、「監獄」等負面東西的代名詞，若說「國粹式」的某某東西，即是要說明所表述的東西是落後、保守、頑固、野蠻與無知的。即使是由胡適等新文化人發起的整理國故運動，他也不表認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他認爲講論國故的人所努力的結果將使「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直指這不是中國的救亡之道，反而是滅種之道。（《墳・未有天才之前》）據此，他要求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希望他們能夠徹底擺脫國學家的欺騙，（《熱風・所謂「國學」》）走出國粹的「虛幻榮光」、並作以下兩種抉擇：「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三閑集・無聲的中國》）他甚至認爲若要爲中國著想、爲青年人好，中國人最好不要識字；如果要清楚講論國學，也必須嵌外國字以及使用新式標點才行。（《熱風・不懂的音譯》）

1920 年代興起的讀經運動，被魯迅視爲影響中國發展的禍根。倡揚讀經的人被他逕斥爲「胡塗透頂的笨牛」，（《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68] 但章氏正是其中一位大力倡言讀經研史以救國的代表人物。對於章氏主張的國學教育當以史學爲重的言論，魯迅多有譏評：

> 太炎先生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保存國性」，眞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史學很生疏。……我在十三年之前，確乎是一個他族的奴隸，國性還保存著，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爲我是不甚相信歷史的進化的，所以還怕未免「後仍有之」。[69]

太炎強調國學、歷史以保國性，宣稱「毫不治史學的」魯迅則害怕自己在滿族統治後僅存的一點國性仍將存在。公開與師立異且有意與之劃清界線，表明的

[68] 上述兩段正文中所引述的文字見於《魯迅雜文全集》（沁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69] 魯迅：〈又是「古已有之」〉，《集外集拾遺》，同前註，頁 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大家在學術思想上的分歧。章氏藉倡國學、推讀經以建立國人的自信心和增加民族文化認同感，目的在於強國救國，而魯迅則大唱反調，反將這些舉措視爲民族被世界拋棄之禍首。讀經、讀古書是發掘國粹的必經門徑，魯迅均與師立異，不但反讀經，更倡言白話文、漢字拉丁化和揚棄古書古文。

雖然章氏在晚清十年爲了排滿革命而曾贊賞一些用白話文書寫的作品，但民國建立後則不復見其有任何稱說白話文的言說。魯迅態度則很一貫，民國成立後更躍身成爲推行白話文的急先鋒。對待白話文的立場與態度決定了他們在新時代的角色。在後續引述中，可以看到對白話文的維護成爲了他自稱不敢面見太炎的關鍵因素。既然這是他提供的唯一一個不敢面見太炎的解釋，我們很有需要看看他們在對待白話文的態度上究底存在著多大的思想差異。

魯迅曾盛贊鄒容的《革命軍》用字「淺近直截」，其影響力勝過其他「千言萬語」的著述。[70] 清末時的太炎亦有相同論調，認爲它能使「屠沽負販之徒」「徑直易知」，有助國民「恢發智識」，知得要驅除異族和光復華夏。他也贊許黃世仲的《洪秀全演義》，認爲它用字淺白適俗，有助提挈民族主義，形成逐滿反清的革命風氣。他說：「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是書用字淺白適俗，正好把古人之用心以及國家種族之事「附之以街談巷議」，爲「里巷細人所識」，使「田家婦子」也知得華夏國故。[71] 但革命成功後，聲稱自小便已「慕退之造詞之則，爲文奧衍不馴……欲使雅言故訓，復用於常文」[72] 的章太炎旋即不再強調白話文的這種作用價值，與魯迅在民國後對之更加大力推行的做法迥然不同。

事實上，太炎一生均喜用古雅深奧的文字表述學問識見，即使是撰寫報刊文章亦是如此，故招來不少批評。黃遵憲云：「章君〈學會〉，論甚雄麗，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報館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讀之而悉通，則善之善者

[70] 魯迅：〈雜憶〉，同註 23 ，頁 221 。

[71] 章太炎：〈章序〉，黃世仲：《洪秀全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年 1 月），頁 1 。（此序撰於 1906 年 10 月）

[72]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同註 15 ，頁 1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矣。」葉瀚亦批評云：「論文（按：指〈學會大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太艱澀，洗太散碎，觀者頗不悅目，操筆人宜囑其選詞加潤爲要。」[73]

太炎基於革命的需要而肯定白話文的某些好處，但如果要以此證說他對白話文的肯定態度則恐將流於片面，因爲他本人絕不熱衷於書寫白話文。近三十年來雖有《章太炎的白話文》再次刊行，論者亦頗以之證成太炎對白話文的支持，並稱其爲從「古文學的『押陣大將』」一轉而成「新文學」的「開路先驅」。[74] 但這本小書所輯錄的不過是太炎出走日本時的演講記錄，記錄者乃至刊印成書者既非太炎本人，則此例還不足以作爲立論證據。

究查太炎一生崇尚古奧文字的風格是很一貫的，至晚年還撰〈白話與文言之關係〉（1935年5月27日）批評那已經極爲流行的白話文。他在這篇文章中舊調重彈，認爲小學不通，白話文便不能寫好，又認爲時人的語言文字學素養如果不勝顏之推祖孫及韓愈，便無資格談論白話文。他自稱不敢貿然做白話文的原因就是恐學力不及顏氏祖孫，而識字之功又不超越「昌黎十倍」，[75] 故惟有專心做文言文。書寫白話文便這樣地被當世小學大師說成比書寫文言文更爲艱深困難。

在討論魯迅如何反擊章氏的白話文態度前，有需要先了解章氏本人在白話文大行其道之際仍舊調重彈的原因。他曾說：

> 我在清末對孔子有所指責，那主要是因爲不滿康梁之徒熱心於利祿。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孔反禮教反舊道德以至反文言文，實在太胡鬧、太無知了！[76]

時人的「胡鬧」「無知」是他維護文言文的原因之一。按他個人的經驗，寫白話文是難於寫文言文的，但目下那些學力不比顏、韓優勝十倍的人竟「忘其顏

---

73 同註15，頁44-45。

74 陳平原：〈導讀：學問該如何表述——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陳平原編：《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頁1。

75 章太炎：〈白話與文言之關係〉，《國學概論・附錄一》（香港：香港學林書店，1965年5月），頁115-116、119。

76 蔡尚思：〈章太炎〉，傅杰編：《自述與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頁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厚」地競寫白話文和反文言文，故不得不舊調重彈以正學弊。

他反白話文的原因還有以下兩點：第一，幅員廣闊的中國是不能推行白話文的，原因是還未做到言文合一，而言文不能合一是因爲大家未有顏、韓之語言文字功力，未有他們的深通小學的功力，就無法處理通借字的問題；若執意爲之，勢將無可避免地出現讀錯音、寫錯字的問題，因爲現在口頭語往往存在某音某字其實就是古代的某音某字的情況。但問題的重點不僅止此，更在於白話文當依何方語言爲準則的問題一直難有定論。[77] 第二，借用邵力子之言，太炎排拒白話文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即是存在了一種「白話文盛行，國學即將廢絕」的憂懼感。[78]

在章氏的思想裏，民族的語言文字是「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79] 且有「衛國性、類種族」之功效。[80] 故維護民族傳統語言文字的純正性與獨特性是「保學」乃至「保國」的根本要事，變質的語言文字將使國學傳播與研究產生障礙。國學一旦受影響或被拋棄，則「學」亡而「國」亡。用他的話說就是「學術既亡……而中國將殄絕」。[81] 最能闡釋他這種「學亡而國亡」觀念的莫如他在清末時便已宣稱的：

> 夫國學者，國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爲尤岌岌乎？[82]

這彰示了他對一國固有之學與民族存亡緊相結合的看法，也交代了他對文言文

---

77 章太炎：〈白話與文言之關係〉，同註 75 ，頁 116 。

78 邵力子：〈志疑〉，同註 75 ，頁 73-74 。

79 章太炎：〈小學略說〉，《國故論衡・小學十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4 月），頁 10 。

80 章太炎：〈重刊《古韻標準》序〉，《章太炎全集第 4 册・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9 月），頁 203 。

81 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傷辭〉，同前註，頁 225 。

82 同註 5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作爲傳統漢語表述形式的維護及其反對白話文的根本理由。尤有進者，基於這種學亡國亡的觀念，他不只維護文言文這一傳統書寫文體，並且對表述這種文體的文字選取表現得態度嚴謹和趨向保守。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他有種力求文字本義以及偏執於書寫古字、本字的習慣傾向。這一看來頗爲不合時宜的舉動，原來是寓意深遠的：

> 世方瞀惑，余之所懷，旦莫難遂。猶願二三知德君子，考合舊文，索尋古語，庶使夏聲不墜；萬民以察，芳澤所被，不亦遠乎？[83]

他的《新方言》、《文始》諸書的努力方向，便是欲藉古語舊文的恢復以圖夏聲之不墜，使民族的典章古訓毫無隱曲地彰示後世，由是達至保種救國之學術經世功效。[84] 職是之故，他不但希望身邊的有志者與其並肩努力，同時也希望能夠將之普教國人——其言曰：「余以爲文字訓故，必當普教國人。」他希望發揚文字訓故之學，從而直收以下功效：「九服異言，咸其擅其本始，乃至出辭之法，正名之方，各得準繩，悉能解諭。」[85] 要言之，章氏自1910年明言「文言合一，蓋時彥所嘩言也」開始，[86] 其人維護文言文而批判白話文的基本態度已是清晰可見，而此一定調堅持至晚年也是沒有改變的。

章太炎欲藉語言文字以圖保種救國之方，正好凸顯了他與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差異。在相同的救國目標下，白話文在不同時期以及在不同思想主張的人手中因爲不同的詮釋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效用。當白話文被看作是引介新知識、表達新學術觀念和傳達新思想的新方法時，它也可以是被看作變亂典章古訓、損害國故、棄絕國學的胡鬧手段。在當時銳意求新求變的時代氛圍下，章氏的學術思想難免給新文化人一種保守退後的感覺。他反對白話文的言論很快就引來魯迅的公開批評，在〈白話與文言之關係〉一文刊行的一個月左右，魯

---

83 章太炎：〈正言論〉，同註79，頁44。

84 關於太炎選述《新方言》的思想旨歸，可參劉師培的〈《新方言》後序〉，《章太炎全集第7冊・新方言》，1999年5月，頁133-134。

85 同註83。

86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迅便發表了〈名人和名言〉的批駁文章，點名批評章氏把自己「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大了。」他尤不滿章氏堅守《說文解字》以治學的作風，不認同寫白話文時每字都要到《說文解字》裏找本字，直言白話文是寫給人看的，「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他批評說：

> 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87]

魯迅還把反對白話文的人譏爲保古家：

>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88]

魯迅對保古家與國學家的批評大多都涉及到章氏；而這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交往關係。魯迅自1915年最後一次探訪章氏後直至1936年二人相繼離世爲止——亦即新文化運動發展的二十多年間，再也不曾探訪章氏，也從未與其通信。[89]他不探訪章氏的原因，按其自辯是這樣的：

> 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爲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90]

把上述之言再跟〈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結合起來觀之，便能釐清魯迅在後半生不與章氏交往的原因：第一，不滿乃師在民國後的行誼——與孫傳芳等

---

87 同註62。

88 魯迅：〈古書與白話〉，同註68，頁196。

89 究查章魯二氏間的通信，目前可見的只有一封。章太炎於1909年5月14日致信周氏兄弟，邀請他們一起學習梵文，全信共字36。周氏兄弟接信後，前往學梵語的只有周作人，未見魯迅蹤影。〔周作人：〈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劉緒源編：《苦雨齋主》（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頁258-261。（寫於1936年12月20日）〕此信是太炎唯一一封致周氏兄弟的，相比於致錢玄同的59通、致吳承仕的89通，可謂相去甚遠。而魯迅一生中未曾致信太炎。由此觀之，實不易見出二氏間有過深厚交誼。

90 魯迅：〈致曹聚仁〉，《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方勢力人士互有交往並「參與投壺，接受饋贈」，[91] 這是魯迅所說的「師如荒謬，不妨叛之」[92] 的原因。第二，因爲二氏在學術思想方面的分歧擴大，魯迅不滿乃師倡讀經尊孔、反白話文和欲藉國學以救國的落後思想。在他眼中，章氏的學行是「和時代隔絕」的，故將其評爲「既離民衆，漸入頹唐」。魯迅對自己常常批評章氏也是有所察覺的：「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93] 但如果他眞有歉意的話或者是果如論者所說的「章氏可說是魯迅所最欽佩的老師」的話，應不會繼續譏評章氏其人其學，對章氏的客觀褒貶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彼此間的疏離關係。他自稱因爲主張白話文而不敢面見乃師可能是表面的搪塞之詞，因爲芸芸章門弟子從不因學術思想的差異而不敢面見乃師，而章氏也不會因爲弟子的學術觀點與己有異而點名斥責之。

以白話文或新文學運動爲例，當時主張白話文或推動新文化最力的，除了胡適、陳獨秀外，不可忽略的還有在民初主政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及後來的國學門的章門弟子。[94] 章氏自封的五大弟子——「天王」黃季剛，「東王」汪旭初，「西王」朱希祖，「北王」吳承仕，「翼王」錢玄同，其中東、西、北、翼四王均曾任教北大。論者紛紛指出：正是出於「聲韻訓詁學大家」的錢玄同的支持和鼓勵下，胡適、陳獨秀等人才有效推行白話文運動。[95] 在錢氏的鼓勵和敦促下，周氏兄弟加入了《新青年》行列，沈尹默與沈兼士兄弟在《新青年》發表

---

91 同註 38 。

92 同註 90 。

93 同註 62 。

94 根據陳以愛的研究，從 1914 年至 1930 年代初，章太炎的弟子不僅一直是北大文科的主流派，對校政也發揮很大的影響；要到 30 年代，他們的勢力才逐漸式微，而由蔣夢麟、胡適留美勢力取而代之。單以 1918 年爲例，在北大文科及預科的太炎門生便有十多名。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1999 年），頁 22 、 30 。

95 持是論者分別有：陳獨秀的〈答錢玄同〉、胡適的《胡適口述自傳》、黎錦熙的〈錢玄同先生傳〉、周質平的〈胡適與錢玄同〉。資料出處同前註，頁 46-5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超過20 首白話詩，被周作人戲稱爲「太炎同門中的老大哥」的朱希祖也在《新青年》連續發表了兩篇白話文文章〈白話文的價值〉、〈非「折中派的文學」〉。[96] 這些資料可見，勇躍支持白話文運動的太炎門生並沒有因學術思想立異而不敢面見乃師。相反，他們交往如昔，而太炎也未有點名責罵他們。即使是對於批判國粹、在《新青年》寫「雙簧信」和主張廢除漢字的「疑古玄同」，太炎還將其視爲五大弟子之一。錢氏是白話文運動中的關鍵人物，也與太炎反目的劉師培保持師友之誼，更拜受太炎批評的今文學大家崔適爲師，這樣一位特立獨行而思想多元之人最後獲太炎視爲五大弟子之一。至於何以只被封爲「翼王」，曾有人就此詢問太炎：「五大弟子裏，錢玄同的名聲很大，爲甚麼封他作『翼王』」？章太炎笑答：「因爲錢玄同常常喜歡『造反』，鬧獨立。」錢玄同與友人談起時說：「先生既然封我作『翼王』，那我只好做『石達開』了，不過我的人生道路上是決不會出現一條『大渡河』的」。[97] 師弟間融洽深厚的關係清晰可見。1932 年太炎北上視察和講學，新舊門生環繞左右而獨欠魯迅；錢玄同更常侍左右，並擔任太炎演講時的翻譯工作。當時出席太炎演講會的錢穆記曰：

> 太炎上講臺，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臺側。一人在旁作翻譯，一人在後寫黑板。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詢之太炎，臺上兩人對語，或詢臺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出雜聲。此一場面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爲錢玄同，寫黑板者爲劉半農。玄同在北方，早已改採今文家言，而對太炎守弟子禮猶謹如此。半農盡力提倡白話文，其居滬時，是否曾及太炎門，則不知。要之，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則知風氣轉變，亦洵非咄嗟間事矣。[98]

---

[96] 同前註，頁 50-51 。

[97] 周維強：《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254 。相同之記述，還見汪榮祖：《章太炎研究》，頁 246 。

[98] 錢穆：〈北京大學〉，《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9 月北京版），頁 18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引顯示了當時演講會情形之一斑以及章門弟子待師甚恭的一面，反映他們師弟間融和親密的交情。太炎對弟子是寬容大度的，不因他們在學術上的立異而將之拒諸門外，而弟子也不因學術與師存異而不敢面見。在錢玄同身上、在同時拜劉師培爲師的黃侃身上均有清晰反映。魯迅自稱不敢面見章氏是因主張白話文之故，反映了對太炎的個性胸襟的認識不深入；或者，其中微妙的心理問題也不足爲外人道的。總之，他們的交誼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深厚。

五

在魯迅的觀感裏，民國成立後的章氏只剩下尊孔讀經、反白話文、參與投壺和接受饋贈的落伍頹唐形象，他把章氏這些「復古」、「荒謬」的學行斥爲「拉車屁股向後」走。[99] 他懷念的只是清末時的章氏。但正確來說，他記憶所及的不是具深厚國學素養的章氏，只是那些攻訐政敵的戰鬥文章。被太炎有意刊落、不讓流傳後世的這些詩文竟被魯迅奉爲最有價值和最值得流傳後世的精神資源。這種反差性的偏愛與他在1920年代以來與論敵公開進行激烈文墨爭鬥的經歷和合，故把早年太炎抗流逆俗的個性與「伐理有序」的辛辣文筆引爲同調和典範。當太炎重刊叢書時有嫌這些文字有失厚道而將之刊落後，魯迅後來反而一再宣稱說：「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更希望他人能牽頭重印之，這無異於有違章氏生前意願而行。如此，也顯示了他對師者之思想性情缺乏了足夠的了解。故這個例子恰恰顯示出章魯二氏在晚年階段思想個性歧異的另一面相，尤展現了大家在晚年時期的不同處世態度、特別是反映了後文所說的魯迅的好戰個性。

揚言「痛打落水狗」的魯迅文筆尖酸辛辣，一生與人筆戰無數，當中涉及不少昔日的親朋好友，造就了後人有機會將之集結成厚厚兩大卷共千多頁的

[99] 魯迅：〈趨時和復古〉，《魯迅全集・花邊文學》第5卷，頁434。（寫於1934年8月1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出售。[100] 相反，早年被人直呼「章瘋子」的章太炎在晚年後已不再「好發議論」，視自己早年「駟不及舌」的批孔言論爲「狂妄逆詐之論」，深悔自己「妄疑聖哲，乃至於斯」。[101] 不獨如此，在他手定《章氏叢書》時，連批評大政敵吳稚暉的文章也一一刊落，不願這些含有人身攻擊的論戰文章繼續流世。但是，魯迅在他的封筆之作的最後數段文字中不認同章氏這種寬容個性，並力陳這種醇厚性情將令自己吃虧。其言曰：

> 今年吳先生（按：吳稚暉）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餘年前的舊帳，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廣，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縱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102]

此言清楚反映其人一生很一貫的特立獨行個性。在抨擊時弊、揭穿人性與社會黑暗面時，這種疾惡如仇的氣質與尖銳冷峻的文字言辭確有其價值，但以之對待師友的話，則他們的某些行誼缺點在他筆下立刻無所遁形。無論是對他有啓蒙灌溉之恩的章太炎，還是鼓勵他作白話文小說而把他推向新文化運動前沿的錢玄同，最後都免不了受到他的口誅筆伐。

魯迅因錢氏「胖滑有加，嘮叨如故」便「默不與談」，[103] 還作詩譏諷云：「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錢氏在〈我對於周豫才之追憶與略評〉一文回應說：

>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

---

[100] 李富根、劉洪主編：《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101] 章太炎：〈與柳翼謀〉同註 51，頁 740-741。（寫於 1922 年 6 月 15 日，同年 8 月刊於《史地學報》第 1 卷第 4 期。）

[102] 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同註 28，頁 452。（寫於 1936 年 10 月 17 日）

[103] 魯迅：《魯迅全集・兩地書》第 9 卷，頁 261。（寫於 1929 年 5 月 2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罷。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二年秋天我來到北京，至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京，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爲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甚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罷。不過這以後，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只好迴避他了。[104]

魯錢二氏間的一場同門交誼便這樣就結束了。[105]

對於老朋友劉半農，魯迅後來也感到「無話可談」，說：「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面，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原因是「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又因爲劉氏「漸漸的據了要津」，於是在最後「漸漸的更將他忘卻」。[106] 再從前文提及的向許壽裳寫的信看來，舊日同門在他眼中幾乎都已後退和變質了，而從他向一些較晚相識的人寫的信看來，他與昔日同道的關係也已形同水火。他在1930 年2 月22 日致信章廷謙云：

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令兄一樣性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至於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廈門與風，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氣，磨了粉也不會改的。疑古亦此類，所以較可以情投意合。……賤胎們一定有賤脾氣，不打是不滿足的。……大約有幾個人還須特別打幾棍，才好。這兩年來，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所以想再來鬧他一下，順便打幾下無端咬我的家伙，倘若

104 同註 13 ，頁 520 。

105 當然，魯迅與錢玄同的絕交內情還牽涉到「一張名片」和「一個人」的因素。名片問題是件極小問題，錢氏說：「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殊不知這一問倒使彼此產生誤會。另一個關鍵的因素便是「一個人」，這人便是在二氏對話期間時出現的顧頡剛——錢玄同要好的朋友，魯迅不喜歡的人。有關論述見周維強：《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頁 218-223 。

106 魯迅：〈憶劉半農君〉，同註 28 ，頁 57 。（寫於 1934 年 8 月 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鬧不死，明年再來用功罷。[107]

同年3月27日再致信章廷謙說：「據我所見，則昔之稱爲戰士者，今已蓄意險仄，或則氣息奄奄，甚至舉止言語，皆非常庸鄙可笑，與爲伍則難堪，與戰鬥則不得，歸根結蒂，令人如陷泥坑中。」[108]1934年5月10日又致信臺靜農說：「北平諸公，眞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109]

魯迅向昔日同道而發的「戰鬥文章」，比清末時章氏攻擊政敵的那些文章更要尖酸刻薄百倍；諸如「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所以想再來鬧他一下……倘若鬧不死，明年再來用功罷」的文字清晰反映了他的挑釁個性與好戰風格。有趣的是，魯迅與人交惡不少是起於一二微不足道的問題。即或他不如錢玄同所說的「多疑」、「輕信」、「遷怒」，在待人方面也少了點雅量。他的敏銳觀察力使他極易發現身邊人的缺點——「多談閒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憶劉半農君〉）。可見得被喻爲「嫉惡如仇」的魯迅，他的另一面其實就是剛烈自我與包容心不足，故在發現友人缺點後，初是「已經無話可談」，進而討厭憎惡之。因猜忌而生的憤懣使他攻擊人的言論常見於報刊，而謾罵他的言論在他離世後仍未停歇。其中的是非曲直問題自是複雜異常，一甲子也難爲學界釐清。魯迅1926年8月26日離開北京前往廈門時，在火車站送行的昔日同門只有許壽裳。對此，我們無須把問題與責任都諉過於魯迅那些「退後」的友儕。諸如衆流皆濁而唯其獨清的評斷，其實質意義是不大的。

當然，本文無意抹殺魯迅的人格，只想彰示一個更全面的魯迅而已。事實上，他也有終生好友許壽裳，更有終其一生最尊敬的老師，但這人並不是早年教他小學的章太炎，而是留學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時的籐野先生。他對籐野

[107] 魯迅：〈致章廷謙〉，同註29，頁247。
[108] 同前註，頁250。
[109] 同前註，頁5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氏確做到了恭謹有加和對之充滿懷念之情。當日本學者編選日文本的《魯迅選集》時，他曾叮囑一定要收錄〈籐野先生〉一文。他也曾這樣說：

> 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
>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賴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110]

上述對籐野的追憶文字，絲毫沒有遊戲筆墨和調侃意味，更沒有譏刺與挖苦的用意，只有褒而沒有貶，只有深情懷念而沒有半點責難，讓人感受到的是極爲濃厚的敬意，這一切跟他評議章氏時的分野是多麼的巨大。他把章氏贈送的字幅交由三弟帶回鄉里，絕沒有要掛在書桌對面牆上時刻懷念其人的意思。可見他未曾視章氏爲其最尊敬的師輩，後來更因學思有異而與之斷絕往來和撰文批評之。明乎此，便可得知太炎之於魯迅如常人，魯迅也不過是因其早年的戰鬥文章而對他尚存一絲敬意罷了。如若眞要探索魯迅本人的戰鬥精神之養成的話，似乎也不是全受自章氏的影響。從上引可見，藤野氏的精神更長久更直接地鼓舞了中晚年的魯迅。故藤野也可說是他「抗流逆俗」，好發「戰鬥文章」以攻擊時人時事的精神資源所在。

綜上觀之，魯迅與太炎的師徒交誼在過去確有被誤解之處；而魯迅對待太炎的眞實觀感也有被扭曲的地方。他臨終前說的一點也不記得章氏授課內容可

---

[110] 魯迅：〈藤野先生〉，《魯迅全集・朝華夕拾》第 2 卷，頁 276-277 。（ 1927 年 10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是眞的，但此說與他的斷辮理由一樣在今天都各有新詮。他的〈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其實已清楚宣稱了斷辮目的是大異於章氏，其中「毫不含有革命性」，只是純爲個人的便利而已：「歸根結蒂，只爲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囟門上，令人很氣悶。」但魯迅的一切言行一旦被看作具有象徵性和時代價值時，他的斷辮之舉便會被看作有意識地要成全某種偉大價值，其行動的本身自然被看作是偉大非凡和具劃時代意義的。

曹聚仁認爲魯迅作〈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以表師德」，讓人看出「他們師生間的契合」。[111] 但必須釐清的是，此文固然刻劃出太炎的早年革命形象與文章風采，但同時也爲其塑造了早年好攻訐而晚年頹唐退後的形象。故全文在表彰師德方面可謂效果不彰。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倒把二氏在晚年時的個性差異呈現出來，再將之與其他相關文章結合起來看時，帶有譏笑挖苦意味的言辭所顯示的不是師弟間的契合關係。正如前文所示，如果純粹是一位敬師甚殷的弟子爲了懷念老師和表彰師德的目的而撰文的話，訾議師輩缺點的文字該不會常常見及的。魯迅對藤野與對章氏的兩種迥然不同態度，實是有了最好的說明與對照。魯迅與章氏的交誼深淺問題於此也可謂是一目了然了。

唐君毅在憶述民國初年學術風氣時說：

> 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甚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甚麼疑古，這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他們早年的思想影響到下一代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承繼他們的早年思想來發展，反過來罵他們的晚年。在北平的時候，我曾聽過梁任公講演，當時我們的年輕人都是罵梁啓超的，說他是退步了。對章太炎也沒有好感，罵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響的人。胡適之，其實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響。[112]

---

111 曹聚仁：〈他的師友〉，《魯迅評傳》（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7年），頁278。

112 唐君毅：〈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唐君毅全集編委會主編：《唐君毅全集第9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374-376。（1979年2月12日首刊於《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早年站在時代前沿引發風潮的人在新文化勃興的年代退了下來，他們在晚年時的思想主張難被後進接受。魯迅與章氏在思想上的分歧不比時人小，他是其中一位在早年受章氏思想影響爾後又倒過來罵他的人，在對待太炎其人其學的態度方面與當時章門以外的一般人毫無二致。相對而言，章門其他弟子卻極少像他那樣時常公開點名批評乃師的。

最後，讓我們看看章太炎是怎樣看待魯迅的。他在1915年寫了一幅字畫托許壽裳送給魯迅後，自此竟是大家停止交往的開始。目前除了魯迅高弟孫伏園記錄的一條資料外，很少發現章氏談及魯迅的語言文字記錄。孫伏園說：

> 太炎先生最後一次到北平去，門徒們公宴席上，問起魯迅先生，說「豫才現在如何？」答說現在上海，頗被一般人疑為左傾分子。太炎先生點頭道：「他一向研究俄國文學，這誤會一定從俄國文學而起。」[113]

從上可見1932年的章氏對魯迅這名早期學生仍有印象，並主動詢問其近況。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示，北上春遊講學的太炎時刻都被門生簇擁包圍，而他這群在京老門生卻已是深爲魯迅討厭的人。雖然門生向他報告魯迅是左傾分子，但在過去數年間一直公開激烈反對共產黨和大力抨擊俄人勢力介入中國的章太炎，[114]聽罷不但沒有立刻斥責魯迅爲「通俄國賊」和「漢奸」，[115]也沒有在門弟子面前對親共左傾的著名人士魯迅加言評議，反而是嘗試尋找藉口爲之開脫，維護舊生之情可見一斑。孫伏園或任訪秋等一批魯迅追隨者與研究者紛紛以

---

[113] 這則資料同時見於太炎門生沈延國的《記章太炎先生》一書。沈延國：《記章太炎先生》（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6月），頁79-80。孫伏園：〈惜別〉，孫伏園、許欽文著：《魯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頁68。

[114] 同註64。

[115] 1926年4月，章氏在上海成立宣稱「共除國賊」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成爲大會的三位理事之一，並擔任該會幹部會主席，發表言論、宣言於全國各報刊云：「赤禍日熾，漢奸日行；以改革經濟爲虛名，而招致外患爲事實，不亟剪除，國將不國。」特組此會，「以反對赤化，保障國權……」「自俄假社會革命之名，行對外侵略」之實，再申「反對赤化，實爲救國要圖。」同註3，頁3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證論魯迅與他的老師之間如何「推心置腹」和「互相契合」。但我們是否在此更可以看到早年毫無忌憚地褒貶人的章氏對舊日學生的雅量呢？

章太炎對魯迅這名久沒交往的舊生的言行活動究有多少了解，或者是他對魯迅這名常在報刊譏評他的舊生的衆多批評究底有甚麼反應，因無文字記錄之故而甚難得知其究竟。但可以肯定的是，章氏最終還是無意視這名曾向他問學、而在當時已享負盛名的名人爲自己的及門弟子，因此在1933年指揮弟子編纂《同門錄》時刊落魯迅的名字而保留周作人的名字。當高弟吳承仕向他詢問不把東京問學的一些弟子名列其中「去取是否有義」時，章太炎只是斷然答云：「絕無，但憑記憶所及耳。」錢玄同向周作人也覆說是「無微言大義也」。[116] 太炎選錄弟子所依標準如何，旁人也是無從得知的。不過，單從他對魯迅這名舊門生默然而不指責的態度或者是刊落舊日攻訐論敵的文章的種種表現觀之，我們已能略窺其晚年個性轉變情況，而他的這一涵養正是晚年魯迅所欠缺的。

綜合上述種種觀之，章魯二氏之間縱有學思傳承的師徒關係，但未能說得上是關係深厚，他們的交誼基本上是由本未深交轉趨淡薄，繼而終至斷絕，當中的眞相及其變化之跡實是有跡可尋的。導至二氏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沒有來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彼此間的學思差異。這些問題經過釐清後，除了呈現二氏的個性特質與部份思想面相外，他們相互間在一甲子來於交誼、學思上被塑造的親緣關係，當中的虛構成份與誤解也就不難看見了。基於此，在組合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時，章魯二氏的學術思想譜系是需要再作思考的，對於這種偏差詮釋出現的種種因由也有探討的需要的。

（責任校對：邱培超）

116 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苦茶——周作人回想錄》（蘭州：敦煌文藝，1995年），頁4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基本文獻

1. 章太炎

章太炎主編：《民報》第7號（日本東京：民報社，1906年9月5日）。

《醒獅周報》第58號第1版（上海：醒獅週報社，1925年11月14日）。

沈延國：《記章太炎先生》（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6月）。

章太炎：〈白話與文言之關係〉，《國學概論・附錄一》（香港：香港學林書店，1965年5月）。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周弘然編選：《章太炎選集》（臺北：帕米爾書店，1979年5月15日）。

湯志鈞編撰：《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

黃世仲：《洪秀全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1月）。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册・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制言》第1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

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

傅　杰編：《自述與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錢　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北京版）。

章太炎著（朱鴻召主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馬　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　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許壽裳：《章炳麟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12月）。

2.**魯　迅**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第1、2、4、5、6、7、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8月）。
魯　迅：《魯迅論文字改革》（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4年1月）。
魯　迅：《魯迅書信集（上、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8月）。
薛綏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李何林主編：《魯迅年譜》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第二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8月）。
魯　迅：《魯迅雜文全集》（沁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錄》（蘭州：敦煌文藝，1995年）。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
許壽裳著、馬會芹編：《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周遐壽（作人）：〈民報案〉，《年少滄桑——兄弟憶魯迅・魯迅的故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孫伏園、許欽文著：《魯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人論著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5年5月10日）。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

王治秋：《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澳門：爾雅社，1978年2月）。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8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任訪秋：〈魯迅論章太炎〉，《魯迅散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李富根、劉洪主編：《恩怨錄・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11月）。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

汪榮祖：《章太炎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7月6日）。

周維強：《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姜義華：《章炳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唐　弢：《魯迅——文化新軍的旗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唐君毅：〈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唐君毅全集編委會主編：《唐君毅全集第9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

章太炎紀念館編：《先驅的蹤跡：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7月）。

陳　崧：《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5年2月）。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

陳平原：〈導讀：學問該如何表述——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陳平原編：《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7年）。

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湯志鈞：《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319-392。

魏若華：《魯迅與他的老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頁125。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